

# 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为何历久弥新?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林志帆\*

## 1. 从“Kaldor 典型事实”说起

英国经济学家 Kaldor 于 1961 年在其著作《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中提出了现代经济的一组典型事实 (stylized facts), 其中就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的论断。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它是确定总体生产函数形式的参考标准。例如, 在形如  $Y = F(K, L) = K^\alpha L^{1-\alpha}$  的生产函数中, 基于要素价格等于边际产出的新古典假设,  $MP_K = \alpha K^{\alpha-1} L^{1-\alpha}$ 、 $MP_L = (1 - \alpha) K^\alpha L^{-\alpha}$ , 可以得出资本要素的收入  $Y_K = MP_K \times K = \alpha K^\alpha L^{1-\alpha}$ , 劳动要素的收入  $Y_L = MP_L \times L = (1 - \alpha) K^\alpha L^{1-\alpha}$ , 两者所占比重分别等于各自的产出弹性  $\alpha$  与  $1-\alpha$ 。因此, 要素收入份额是否稳定可以视为 Cobb-Dauglas 型生产函数的一个“弱检验”。

在二十世纪, 对于数据可得的英国、美国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而言, 要素收入份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稳定 (Hicks, 1932; Keynes, 1939; Solow, 1958), 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Guscina, 2007)。从更大的范围来看, Karabarbounis 和 Neiman (2014) 的数据表明: 近 40 年来, 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由稳定状态转而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无论是企业部门、还是宏观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 均出现了接近 10 个百分点的降幅 (如图 1)。Kaldor 典型事实与 Cobb-Dauglas 型生产函数不断受到经验证据的冲击和挑战, 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得到了文献的广泛关注 (如 Blanchard 等, 1997; Harrison, 2005 等)。

当然, 如果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含义, 那么这个主题的研究便不可能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紧密相连的一个现实现象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由于劳动要素的分布天然地比资本更为平均<sup>①</sup>, 因此, 要素收入分配偏向资本, 这意味着国民收入集中于少数的资本所有者, 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演变为规模性的失衡, 这会引发贫富差距的扩

\* 林志帆,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博士生; 电子邮箱 [lopez193@foxmail.com](mailto:lopez193@foxmail.com)。

① 人人都可以供给一定量的劳动 (尽管人力资本与劳动具有异质性), 但资本往往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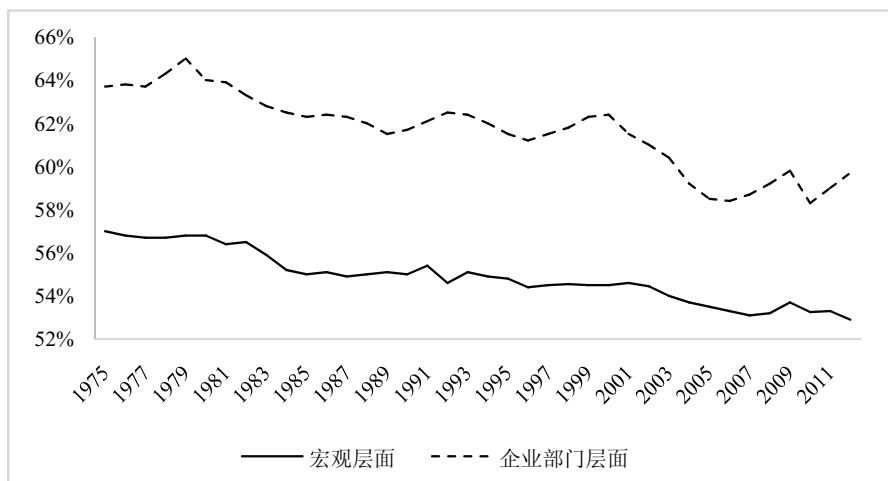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范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

大,进而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威胁。而且,由于高收入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与财富的集中还会引发消费不畅、社会总福利水平偏低、储蓄率偏高等一系列失衡现象。在近年来一些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因素(Daudey 和 Garcia-Penalosa,2007;Jacobson 和 Occhino,2012)。图2显示<sup>①</sup>:在全球范围内,基尼系数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收入分配越偏向资本要素,贫富差距也就越大<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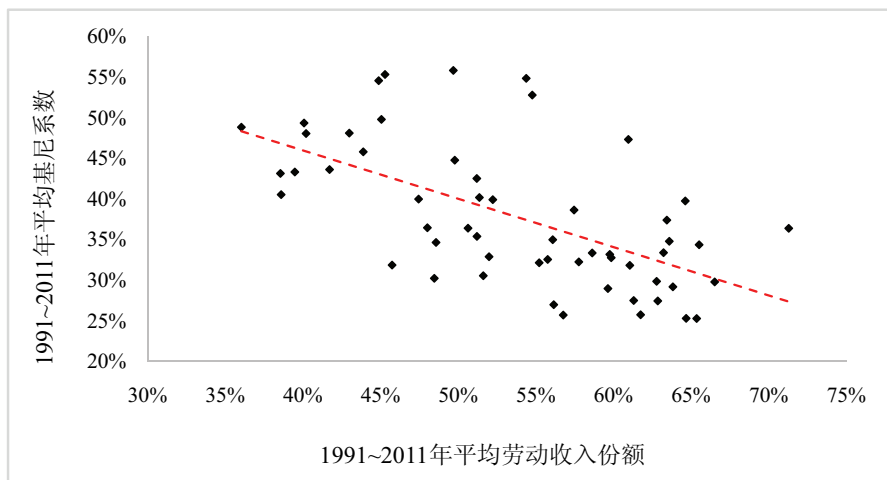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55个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① 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链接:<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8.0 版,链接:<http://www.rug.nl/research/ggdc/data/pwt/pwt-8.0>。

② 当然,图2显示的仅仅为两者的无条件相关性,不宜做过度解读。更为具体的量化关系需要由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得到,而最为关键的因果关系则需要借助一些“准自然实验”和巧妙的实证设计才能判断。

2. 要素收入分配失衡的几种解释

围绕全球范围要素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角度与结论可归纳为:

(1)发展阶段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Solow(1958)最先提出结构分解法,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产业间效应”与“产业内效应”两部分影响<sup>①</sup>。一般而言,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第三产业次之,而第二产业最低。因此,一国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当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过渡到第二产业、并最终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时,由三次产业的产值加权确定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应服从U型的变动趋势,这可以归纳为“产业间效应”的影响。图3显示:在对人均GDP对数值与劳动收入份额均取1975年—2011年的均值之后,全球各国的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确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这仅反映两者的截面相关性。回顾图1可知,在大多数国家经历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并未遵循U型变动规律,而是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提供的详细数据<sup>②</sup>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在过去四十年间基本都出现了下降。因此,“产业间效应”的解释力似乎只存在于截面层面上,而在时序层面上并不成立。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尽管三次产业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可能依旧存在,但各个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都出现了下降<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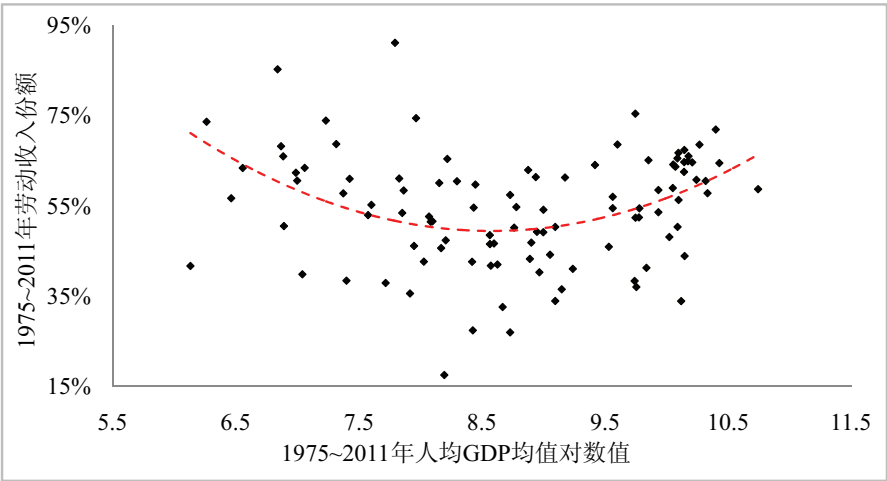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103个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①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都强调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结构因素的影响。  
② 这份数据可以从作者的个人主页下载得到,链接:<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loukas.karabarbounis/>。  
③ 在涵盖大多数发达国家KLEMS数据库中,十个主要经济部门中有八个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2) 国际贸易扩张与全球化趋势: 国际贸易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是实证文献中显现出来的一个非常稳健的经验事实 (Ortega 和 Rodriguez, 2002; Harrison, 2005; Guscina, 2007; Elsby 等, 2013)。其中一个代表性文献是, Harrison (2005) 使用 1960 年—2000 年间 100 余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贸易开放度在多种模型设定中均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实际上, 国际贸易与要素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并不缺乏理论支撑: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Heckscher, 1919) 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Stolper 和 Samuelson, 1941) 的结论, 一国开展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而专业化分工将提高本国密集使用的相对丰裕的要素的收入。据此可以推知, 在国际贸易扩张的大背景下, 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将下降, 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将上升, 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都呈现下降趋势。新古典贸易理论显然不能描绘世界各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全貌。

因此, Guscina (2007) 与 Decreuse 和 Maarek (2008) 放松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 指出与贸易扩张紧密联系的跨国资本流动使得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议价能力” (bargaining power) 受到侵蚀, 工会影响力与劳动保护的式微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 如果在产品市场中厂商的市场势力有所增强, 价格相对于成本的“加成” (mark-up) 上升, 此时新增的超额垄断利润全部归于资本, 劳动收入份额也会发生下降。当前, 要素市场扭曲与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 成为要素收入分配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

(3) 偏向型技术进步: 要素收入分配的失衡使学者们重新审视生产函数的合适形式, 常替代弹性 (CES) 生产函数 (Arrow 等, 1961) 逐渐成为研究的理论范式。在 CES 生产函数中, 要素收入份额由劳均资本、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替代弹性联合决定。在此基础上, Acemoglu (2002、2003) 指出, 技术进步的偏向受“价格效应” (price effect) 与“市场规模效应” (market size effect) 两种相反的作用机制的影响, 前者激励厂商开发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技术, 后者则激励厂商开发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技术。要素替代弹性  $\sigma$  越大, “市场规模效应”就越大, 长期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就越偏向于充裕的生产要素。后续与偏向型技术进步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为测算要素替代弹性  $\sigma$  的大小: 根据 Chirinko (2008) 整理的结果, 相当数量的文献估计得到的  $\sigma$  值分布于 0.4 至 0.8 之间 (Sato, 1970; Antras, 2004; Juselius, 2008), 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间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如果  $\sigma < 1$ , 当资本劳动比上升时, 劳动收入份额将趋于上升, 这与现实中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两大现象并存的事实并不相符。Leon-Ledesma 等 (2010) 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证明, 基于传统的单方程模型和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得到的  $\sigma$  值可能存在的下偏, Klump 等 (2007) 所使用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 (normalized supply-side system) 是最为稳健的估计方法。戴天仕和徐现祥 (2010) 采用该方法测算得到的中国的  $\sigma$  值约

为 0.73;而 Karabarbounis 和 Neiman(2014)测算得到的全球范围的  $\sigma$  值大致为 1.25。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其二为探索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成因:Acemoglu(2007)指出,在要素替代弹性足够大的长期,成本的驱动与厂商的经济理性将使得技术进步偏向于供给充裕的要素。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供给下降、工资上升以及劳动力保护力度的提升,可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成因。另外,环境规制因素——诸如碳税和新能源补贴——可能促进技术进步的发生和节能清洁技术的开发(Acemoglu 等,2012)。从现实来看,在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由于油价高涨,以节油为主要卖点的日本汽车便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油价的上涨也促进了节油型及混合动力发动机的研发。张莉等(2012)则从国际贸易与跨国技术扩散的角度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机器设备与生产技术使得其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资本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增加。

### 3. 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研究评述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始于 1995 年前后,至 2007 年达到最低点,下降了十余个百分点;即便在剔除 2004 年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之后<sup>①</sup>,下降幅度仍大于六个百分点<sup>②</sup>。最近数年下降趋势虽然有所减缓,但仍徘徊于 45% 左右的低位。学者们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许多有趣的转型事实与制度现象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解释,取得了如下所述的丰硕研究成果:

早期的文献主要以省级与行业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行了宏观层面的探讨。例如,李稻葵(2007)认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企业利润与政府生产税净额的提升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三大主要因素<sup>③</sup>;白重恩等(2008)针对工业部门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改制与厂商产品市场垄断能力的提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邵敏和黄玖立(2010)认为:贸易开放、FDI 的“负向工资溢出效应”、行业资本密集度和资本回报率的提升、

① 宏观数据的测量误差是各国要素收入分配研究的“通病”。Gollin(2002)认为,忽略对个体经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以及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统计口径的变化构造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假象”。Elsby 等(2013)的数据证明,美国近数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约三分之一的下降源自于统计口径的变动。

② 一些文献试图矫正统计口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的影响,如吕光明(2011)。另外,周明海(2014)提出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区分,认为在考虑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估算值比现有文献中的名义估算值低 6~14 个百分点,且下降幅度更大、下降持续期更长,表明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恶化比预期更为严峻。然而,这些文献提供的新数据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也未得到统计局的官方认可。实际上,近年的研究转向使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的动因之一即为规避宏观测量误差以及对统计数据做主观调整。

③ 然而,在第二产业内部,翁杰和周礼(2010)基于 1997 年—2008 年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行业本身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致,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很小。



地方政府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等,均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

近年来国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逐渐转向使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这些文献讲述了许多有趣的“经济故事”,也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实证设计与经验证据。学者们使用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其一为国泰安、万得资讯等数据商所提供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库;其二为国家统计局采编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三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采编的多轮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其四为世界银行在 2003 年、2005 年与 2012 年对中国企业进行的三轮调查问卷数据。

由于上市公司数据质量较高、更新较快且获取便捷,因此使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为丰富,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如方军雄(2011)运用中国上市公司 2001 年—2008 年的数据发现,无论是全体员工的收入份额、还是普通员工或是经理层的收入份额都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王灿等(2013)以 2004 年—2011 年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国有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而非国有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则呈下降趋势。这些发现与宏观统计数据所呈现的下降趋势并不一致,考虑到中国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这便启示我们:长期以来未受文献关注的私营部门与中小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能比宏观数据所揭示的情况更为严重。

张杰等(2012)使用 2001 年—2007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发现:资本密集度的提升、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具有负面影响,而宏观层面的市场竞争度、劳动者的法制保护力度则具有正面影响。余森杰和梁中华(2014)将中国于 2002 年加入 WTO 后关税的迅速下降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DI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资本品、中间投入品与技术引进的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另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则由钱震杰和朱晓冬(2013)完成,他们使用 1998 年—2007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工业统计数据库(INDSTAT)在 4 位数的制造业层面上比较了中国与 79 个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控制了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时间趋势以及行业虚拟变量之后发现:尽管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但平均而言,各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过,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覆盖了第二产业的企业,且目前公开可得的数据截止于 2007 年,距今已有八年之久,因此我们应当谨慎看待基于该数据库所做研究的代表意义以及对当前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状况的解释力。

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和世界银行调查问卷数据则提供了更多的关于中小民营企业的信息。利用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魏下海等(2013a)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在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法治水平较低、政府掠夺越严重的地区,这一负面效应的影响幅度更大。魏下海等(2013b)还考察了工会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

工会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的原因在于工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后者的提升幅度更大,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了。罗长远和陈琳(2012)使用世界银行前两轮调查数据,以长短期的负债资产比作为衡量指标对融资约束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的企业特征、年度与行业虚拟变量后,较高的负债资产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林志帆和赵秋运(2015)对该文的主要批评意见在于:负债资产比是否适用于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sup>①</sup>?他们更新数据并使用宏观层面的金融抑制指标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解释,发现:金融抑制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这一机制对于具有外资或国有成分的企业不成立,显示出明显的“所有制歧视”特征;此外,金融抑制的负面冲击对于中小规模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更为严重。宁光杰(2013)使用世界银行第二轮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扭曲制度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此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服务业企业的变量信息缺失较多,难以支持回归分析,因此前述的三篇文章都只保留了制造业企业的样本,这部分研究仍然未能完全揭开微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面纱”。

#### 4. 潜在问题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献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进行解释时往往将“资本收入的挤占”列为原因之一。实际上,在宏观层面上,如果使用收入法对国民收入进行核算,有恒等式“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成立,而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较低且相对稳定,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也反映为资本收入份额的提升;在微观层面上,简单地讲,企业进行生产后也只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分配,将“蛋糕”切为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两块,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质上反映同一个现象,并不存在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果关系。在学者们越发关注研究设计的细节与计量技术的今天,基本概念的辨析与经济层面上因果关系的思考仍非常重要,否则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释与相关政策建议的推导。

现有实证文献结论中的相悖之处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例如,在中国,企业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尚未明确。现有文献中,企业规模一般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但回归估计

---

①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拥有一系列健康的财务指标及较高的负债资产比,恰恰说明它能够在金融市场上便利地进行融资,较高的负债资产比反而是其不受融资约束影响的体现。相反地,一个负债资产比很低甚至为零的企业可能是由于经营不善难以获得乐观评价,无法得到贷款,面临严重的融资困境。另外,查看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1999年—2007年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负债资产比分别为69%和57%,国有企业的负债资产比非国有企业更高,如果较高的资产负债比真的表征较严重的融资约束的话,从数据中可以得出国有企业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状况的结论,这明显与现实情况是相悖的。

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张杰等(2012)使用固定资产净额的对数值衡量企业规模,魏下海等(2013a、b)使用员工人数的对数值衡量企业规模,均发现企业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林志帆和赵秋运(2015)使用销售额的对数值衡量企业规模,在多种设定和分样本中都得到显著为负的结论。结论的差异既可能源自于变量选取、样本数据、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存在未知的非线性关系,而求得一个稳健的结论与明晰的影响机制应当成为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诸如土地价格的上升、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税收制度的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等因素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薪酬制度、雇佣决策与劳动收入份额,此为“前因”的研究;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宏微观层面的“后果”,仍有待探索。一个研究热点的经久不衰需要广大的学者不断去探索可能的发展方向,去吸收借鉴其余领域研究的精华;正是国内外一大批经济学者的不懈努力才使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得以历久弥新。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2002,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781–809.
- Acemoglu, D., 2003, Labor and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 1–37.
- Acemoglu, D., 2007, 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 *Econometrica* 75, 1371–1409.
- Acemoglu, D., Aghion, P., Bursztyn, L., Hemous, D., 2012,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131–166.
- Antras, P., 2004, Is the US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Cobb–Douglas? New estimates of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The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4, 1–36.
- Arrow, K. J., Chenery, H. B., Minhas, B. S., Solow, R. M., 1961,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25–250.
- Blanchard, O. J., Nordhaus, W. D., Phelps, E. S., 1997, The medium ru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89–158.
- Chirinko, R. S., 2008,  $\sigma$ : The long and short of it,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0, 671–686.
- Daudey, E., García-Peñalosa, C., 2007,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 812–829.
- Decreuse, B., Maarek, P., 2008,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 Elsby, L., Hobijn, B., Şahin, A., 2013, 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63.
- Gollin, D., 2002,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 458–474.
- Guscina, A., 2007,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IMF working paper.
- Harrison, A., 2005,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 Heckscher, E. F., 1919,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ambridge: MIT Press.



- Hicks, J. R., 1932,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 Jacobson, M., Occhino, F., 2012, Labor's declining share of income and rising inequality, *Economic Commentary* 13 (Spt. ).
- Juselius, M., 2008, Long-run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ndirect evidence on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0, 739–756.
- Kaldor, N.,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 Karabarbounis, L., Neiman, B.,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61–103.
- Keynes, J. M., 1939,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The Economic Journal* 49, 34–51.
- Klump, R., McAdam, P., Willman, A., 2007,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factor-augmenting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ormalized supply-side system approac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183–192.
- Ortega, D., Rodríguez, F., 2002, Openness and factor shares, Office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dvisors (OAEF), National Assembly, Venezuela: 29.
- Sato, R., 1970, The estimation of biased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79–208.
- Solow, R. M., 1958, 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elative shar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618–631.
- Stolper, W. F., Samuelson, P. A.,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 58–73。
- 白重恩、钱震杰, 2009,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经济研究》, 第 3 期, 27–41。
-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 2008,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 《经济研究》, 第 8 期, 16–28。
- 戴天仕、徐现祥, 2010, 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 《世界经济》第 11 期, 54–70。
- 方军雄, 2011, 劳动收入比重, 真的一致下降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发现, 《管理世界》第 7 期, 31–41。
- 李稻葵, 2007, 重视 GDP 中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 《新财富》第 9 期, 40–41。
- 林志帆、赵秋运, 2015, 金融抑制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 ——来自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中国经济问题》待刊出。
- 罗长远、陈琳, 2012,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 ——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研究》第 3 期, 29–42。
- 罗长远、张军, 2009,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65–79。
- 吕光明, 2011,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 1993–2008, 《统计研究》第 12 期, 22–28。
- 宁光杰, 2013,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当代经济科学》第 2 期, 61–70。
- 钱震杰、朱晓冬, 2013, 中国的劳动份额是否真的很低: 基于制造业的国际比较研究, 《世界经济》第 10 期, 27–53。
- 邵敏、黄玖立, 2010,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1189–1210。
- 王灿、王文兵、干胜道, 2013, 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劳资财务公平评价研究——来自 2004–2011 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审计与经济研究》第 6 期, 54–63。
- 魏大海、董志强、黄玖立, 2013, 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第 8 期:16-28。

魏下海、董志强、刘愿,2013,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 5 期,35-46。

翁杰、周礼,2010,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研究:1997-2008 年,《中国人口科学》第 4 期,31-45。

余森杰、梁中华,2014,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 7 期,22-31。

张杰、卜茂亮、陈志远,2012,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及其动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 5 期,57-69。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2012,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第 1 期,409-428。

周明海,2014,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估算及其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108-116。